



1973年我在边防连队向党宣誓，眼前闪回电影《党的女儿》《上甘岭》里党员的光辉形象，为完成党的任务，不惜牺牲一切，勇于斗争，永不叛党。当我进入电影圈做编剧工作，求教林杉先生，他告诉我，为写《上甘岭》电影剧本他曾两次赴朝，采访57位指战员，近200天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钻进上甘岭坑道，坑道里只能驻守一个连，主角就是连长。有人要求电影中要写中朝两军最高统帅，都被他拒绝了，甚至美军方面连一个少尉都不写，集中笔墨讲述张忠发连长带领全连克服困境坚守阵地，利用坑道战击败美国联军现代武器的进攻。他说，电影不是流水账纪实，不能把史料当艺术，要到生活中找到完成主题的人证，在正常中写反常，在平凡中找非凡，写好志愿英雄们守阵地的感人故事，编剧要有坚守真理的勇气。

在建党百年之际，我更加缅怀林杉等一批老编剧，在创作党史题材电影方面，他们留下了《开国大典》《南昌起义》《大决战》《赵一曼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一系列经典之作，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。虽然他们不能与我们共同庆祝党的百岁生日，但他们讴歌党的电影却与党同在，与人民同在，他们对党的深情永远烙印在影片中，播种在人们心灵间，他们从党史中汲取人物和故事，用剧本传承红色基因，为中国电影编剧开拓了方向。

题材无禁区，作家有立场。我创作的电影《蒋筑英》获得了1993年国家政府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。从此，我以祖国杰出人物和优秀共产党员为创作目标，将人民喜爱的共产党人搬上银幕：乔安山是雷锋精神的忠诚传播者，他在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中，孔繁森两次援藏，捐躯高原，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（《孔繁森》）；被誉为“党的好干部，人民的贴心人”呼和浩特市书记牛玉儒（《生死牛玉儒》）；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，他把对党的信任和忠诚，融入国旗的设计之中（《共和国之旗》）；崔福顺是吉林省延边和龙县农业银行的储蓄员、勇斗歹徒的朝鲜族女党员，其见义勇为收养烈士遗孤的事迹传为佳话（《良心》）；为中国夺得首枚奥运金牌的英雄许海峰，他是党的十三大代表（《许海峰的枪》）；全国劳动模范、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女法官尚秀云，挽救了上百名失足少年，家长和孩子亲切地称她为“法官妈妈”（《法官妈妈》）；邹碧华是新时代“公正的好法官，敢于担当的好干部”（《邹碧华》）……

我之所以坚持创作共产党人的形象，是因为这些被群众爱戴的共产党人的事迹与品格让我感动，让我一次次产生创作的冲动。蒋筑英是光学专家，创立了光学检测中心，他是中国光学家王大珩先生的弟子，懂五国外语，可以用法语朗诵居里夫人的诗歌。但是，他年仅43岁病逝，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，始终没有解决入党问题，是死后追认的共产党员。我怎能不为之扼腕叹息，这样一位燃烧自己、照亮光学事业的科学家，应该让他的精神照亮中国银幕，我含泪写就这一剧本。

写好共产党人，紧紧抓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

从党史中汲取红色资源 在电影里传承红色基因

我用剧本讲好共产党人的故事

□王兴东

系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我们党的百年历史，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、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历史。”一切戏剧的本质是人物关系，人民群众衡量我们党员干部时就用一把尺子：是替自己捞好处，还是为群众办实事。这就涉及到执政为民的宗旨，是侵害人民利益、贪污腐败还是为民排忧解难。特别是党员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卓见人物的党性。例如身患癌症的呼和浩特市书记牛玉儒，他一心想着奶农饲养的奶牛所患的乳腺炎，他知道患乳腺炎的奶牛会影响产奶量，少产一吨奶，农民就要少收入1700多元。这些源自生活的真实细节，像铆钉一样焊接着党和人民的关系。

来自山东、在阿里高原援藏的孔繁森，身为厅级干部却背着药箱，给藏族牧民送医送药，为收养两位藏族孤儿，他三次卖血。逝世后儿子为他收拾遗物，只有8元6角钱，但保留了一箱子藏民送的上千条哈达。我访问了他身边的亲人，大哥孔繁华说起他卖血的事情，止不住泪水往下流：“知道繁森卖血，俺家里寄几个钱去，也不能让俺兄弟卖血啊！”

写好共产党人，要用好用足一个“情”字。写英雄人物，要拿起情感之铲，挖掘人物的情感世界，挖掘党员与群众心连心的鱼水深情，以人生情、以情生戏、以戏树人。

情在哪里？首先要知道党员在哪里。党员在群众中间，党员不能脱离群众，写好党员形象，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，到群众中去采集党员播撒在人民群众中的情感记忆，像蜜蜂采蜜，把党员和群众的情谊聚合起来，形成戏剧性情感的聚变，自然打动人心。

当少年犯罪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时，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，无数稳定的家庭构成我们的和谐社会。我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深入生活的日子，跟随尚秀云法官多次去少年管教所，看望那些经她审判过的失足少年，给服刑的少年寄去生日贺卡，这位女党员博大的爱心感动了失足少年和家长。电影《法官妈妈》在少年犯管教所放映时，400多名少年犯感动得落泪，有人

拉着尚秀云的手说：“如果我出去了，遇到你这样的法官妈妈，我的前方就是阳光。”法庭无情，法外有情。电影在国外放映，法官妈妈的形象展现了中国对未成年犯罪的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六字方针，深受国外法官的赞赏。

写好共产党人，要敢于去伪存真道出真相。雷锋精神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。雷锋22岁永远离开了我们，都说他是因公牺牲。雷锋班的四位战友向我讲述了乔安山开车意外致使雷锋去世的真相。要不要写出这个真相？当时有人反对表现雷锋因车祸而死，一是怕影响雷锋的光辉形象，二是怕颠覆了此前因公牺牲的宣传。调查研究给了我撬动真相的杠杆，实事求是给了我创作的勇气。我大胆揭开了雷锋因车祸牺牲的事实，新闻电视没做到的，电影做到了。结果观众看到了真相，反而更加敬佩雷锋，剧作的真诚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。

电影《黄克功案件》取材于延安高等法院刑字第2号案件，1937年10月，红军干部黄克功在延安逼婚杀人，公审判决并依法执行死刑，体现了我党不搞官贵民贱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作风，此案作为党史、军史和法治史的经典案例，之所以尘封多年，皆因对红军干部开枪杀害女学生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表现有所忌惮。电影敢不敢面对历史，能不能反映法律制裁特权的审判？当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毛泽东亲笔给审判长雷经天回信，不予赦免，执行死刑。并要求“一切共产党员，一切红军指战员，一切革命分子，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。”我有了书写的勇气，从从严治党、依法治军是我党领袖的一贯意志。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，请求中纪委、最高法和最高检的领导帮助审看，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。终于，电影《黄克功案件》在2014年中国首个宪法日于人民大会堂首映，审判长雷经天和公诉人胡耀邦的形象永存党史电影中。任何创新和突破都是向旧观念的挑战，写共产党人题材更要有不怕牺牲、攻克堡垒的劲头，才会创造出新颖的、不落俗套的故事。

写剧本要创造前所未有的“这一个”，只有走

近他们的情感领域才能发现共性中的个性，才能找到震动编剧自身和观众的戏剧因子，才能感受那金子般闪亮的信念：“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，我只能一支蜡烛两头点。”（蒋筑英）“生命一分钟，敬业六十秒，这就是我的活法！”（牛玉儒）“人的最高境界是为别人，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为人民服务。”（孔繁森）“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，别人不学雷锋我不能不学！”（乔安山）“国家强大，国旗才伟大。”（曾联松）“不是一碗水端平，两碗水都要端平。”（雷经天）“人生如同出膛的子弹，瞄准目标，脱靶的子弹是失败的人生。”（许海峰）……

共产党人也是人，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，也是血肉之躯。雷锋、孔繁森都死于车祸；蒋筑英、牛玉儒、邹碧华被病魔击倒。但是，他们服务人民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，他们共同的特点正在于：永不背叛对党的誓言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他们不欺负老百姓，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。我因为写剧本向他们靠近，探知他们精神世界的矿脉，创作出有别于新闻史料的生动鲜活的角色。我为自己也是一名党员而自豪，为能在电影中创造他们的形象而欣慰，为这些电影能受到大众的喜爱而欢喜。

写好共产党人，必须敬畏党史。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。《建国大业》是我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委员有感而发的创作，依据1948年毛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表的“五一”口号，第5条“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！”当我站在城南庄旧址，顿时感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和伟大胸怀，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，建立全新的政党制度，在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吹响召开新中国的进军号，只有召开政协会议，才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大业。我作为政协文史委员向全国政协领导报告创作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想法，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，我和陈宝光编剧的《建国大业》授权许可制片单位拍摄，上映后引发全

民爱国热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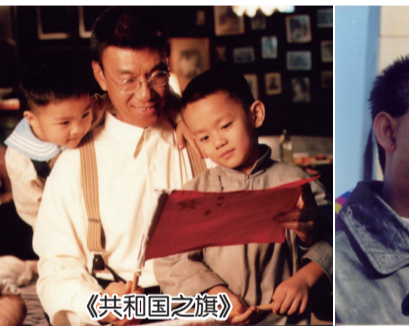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有人批评影片有歪曲史实的地方。比如，解放军一个连长不认识北平城，说成是“地主大院，手榴弹还炸不开，要求火力支援”，团长认出是北平城，遂向上级报告“突击团打到北平城下”。众所周知，北平是和平解放的，我军距城5公里围而不打，那位“用手榴弹炸不开，请求火力支援”破坏京城古建的解放军连长，纯属虚假历史。这不是我们原剧本的情节，我反对借商业目的而调侃戏说历史。党史是血染的基石，不是手里随便捏玩的泥巴，只有敬畏党史，尊重党史人物，才能怀有感情去创造感人形象。

以史为鉴，不忘初心。这是我写共产党人电影的初衷和目标，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群众心灵温暖的丝线，让杰出的党员形象架起沟通党群之间的桥梁。在庆祝建党百年学习党史的热潮中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，“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，特别是影视作品”。前不久，我耗时15年写就的《邓小平小道》，作为国家扶持资助的电影项目已于今年拍摄，写作期间我曾3次去南昌市邓小平劳动的车间，找到与邓小平同劳动的工人采访。

如何让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走向世界，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中，用新方式、新手段、新视野、新故事，塑造好能够在全球传播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，将是中国编剧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
在外国大片愈发眩惑夺目的镜头不断冲击中国电影市场之时，有人问我，讴歌共产党的电影有生命力吗？

我想以一首歌的历史作为回答。那就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这首抗战歌曲从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开始传唱，唱遍晋察冀，唱响全中国，成为脍炙人口的颂党第一歌。然而，熟悉的歌曲背后是陌生的故事。5年前，我们得到曹火星女儿的授权，在京津冀采访了所有熟悉他的人，得知曹火星的哥哥曹岱是国民党，后来曹退台。我和张佑展编剧、丁小明导演的电影《让这首歌作证》已经完成，民声所唱，民心所向，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，选择了“辛劳为民族，一心救中国”的中国共产党。这首歌唱了78年，成为世人共识的真理之歌。《让这首歌作证》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脱贫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。我们要像曹火星那样坚信党，讴歌党，在百年苦难而辉煌的党史中，汲取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力量。



评 点

高于传奇故事本身的家国情怀

——观电视剧《长歌行》 □杜文玉

实是燕郡王），任天节军将军，因反对李世民而起兵造反；名相杜如晦病死于贞观四年（630），电视剧中遂有多处表现其带病奔波并最终病死的场景；唐军平定草原部落后，迎回了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。这一切均有确切的历史记载。剧中对前隋公主形象的塑造，虽然在细节方面有所虚构，但基本符合其人物性格。远嫁草原的前隋公主成为（剧中虚化为“奕承”）在唐朝取代隋朝后，一心要恢复隋朝的统治，曾多次唆使草原部落进犯唐朝，所以剧中对其形象的塑造并非凭空虚构。再比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剧中对魏叔玉与永宁公主关系的表现，也是如此，永宁公主本来对其情有钟，但最终却嫁给了皓都。历史的真实情况是，唐太宗本来将其女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叔玉，魏叔死后，太宗怀疑其阿党，遂颁诏解除了婚约。电视剧的这种安排正是为了照顾到历史真实。

再者，在典章制度方面，电视剧也不存在大的疏漏，比如在官制、军制、服饰、建筑等方面，均是如此。如李世民当了皇帝，其父为秦王时封县主，其父为太子时为郡王，其父为皇帝时为公主，李长歌为太子李建成之女则封郡主，完全符合唐制。再以服饰之制为例，唐初规定，三品以上官服紫，五品以上服绯（红色）、六品七品服绿，八品九品服青。剧中不同等级的官员，在服色上都有确切的体现，甚至同一人物，在不同时期，随着官职的升迁，其服色也都随之发生变化。在妇女的服饰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点，没有半露酥胸的情况出现，说明编导已经注意到了唐初妇女服饰与盛唐时期的不同。甚至在胡人服饰方面也有所体现，如窄袖翻领等。在建筑方面，其形制与色彩方面



基本符合唐代的情况。即使在称呼方面，也是有所关注的，比如把县令称为明府，只不过唐人将其作为对县令的尊称，并非不分场合的普遍称呼。对草原部落特勤等官职的称呼，也符合当时草原民族的实际状况。

总体来说，励志传奇剧《长歌行》在历史背景、典章制度、社会风俗、服饰建筑等方面都符合历史，只有女主人公李长歌与男主角阿诗勒隼、永宁公主等少数人为虚构人物。作为一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传奇剧，《长歌行》虽有虚构但不

虚无。《长歌行》尊重并借用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宏观背景，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创作了微观人物的传奇故事。

在虚构故事中 传递家国情怀的励志剧

贯穿电视剧《长歌行》主线的是超出虚构人物本身的爱国的主题与民族和谐的思想。比如女主人公李长歌对李世民怀着强烈的杀父之仇，必欲手刃而后快，但是当遇到阿诗勒部进犯唐朝边境时，遂又投入到抵御侵扰的战斗中去，以保护边境安全及百姓身家性命。在洛阳遇到大规模的灾疫时，为了救助百姓和防止社会动荡，李长歌也同样付出了很大努力。当奕承公主谋图裹挟草原各部进攻中原时，李长歌又与阿诗勒隼联手，联合唐军挫败了其阴谋。在这期间，李长歌还奔波于草原各部之间，极力劝和，以避免相互杀戮。虽然史实是唐军征服了草原，并不存在与草原某部联手的情况。电视剧这样处理唐与阿诗勒部的关系，就是在利用传奇故事艺术虚构的创作空间传递民族和谐的主题思想。

当然，电视剧《长歌行》毕竟是一部传奇故事剧而不是一部历史正剧，所以虚构创作过程中在历史还原上还存在一些瑕疵之处。如薛雍与明堂不能混淆，尽管古籍中有大学谓之薛雍，明堂亦谓之薛雍的说法，但两者的用途是不同的，前者为讲学之处，后者为天子布政之所，属礼制建筑；唐代实行所谓钱帛兼行制度，不可能使用白银，白银作为交换媒介进入流通领域是后世的事；唐代的章章不应是经折装，而应是卷子装。剧中出现的饮茶风俗也与唐代的情况不符，这一点参看一下法门寺出土的整套茶具就明白了。

尽管存在这些不符，瑕不掩瑜。作为一部励志传奇剧，《长歌行》本就不是在描述历史本身，而是在传递历史留给我们的民族与家国精神，而从这一点来讲，我想这部电视剧仍然是目前拍摄的历史传奇作品中的优秀典范之一。

专家研讨纪录片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

4月12日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、中国电视艺委会、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的纪录片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研讨会在京举行。该片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纪录片作品，于央视纪录片频道、上海卫视、浙江卫视、湖南卫视、北京卫视等19家上星频道，数十家地面频道及近百家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。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立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通过青海示范区建设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，再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、祁连山国家公园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生态风貌，揭示了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。

影片总导演李晓谈到，该片着重讲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，这里的自然不是背景，同时片中试图用不出现人的名字、人活动在户外等方法，淡化人本身。“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土地的故事，而且是探讨特定区域的植物、动物和人的关系，以及人与大地沟通时所产生的心灵感应。”中国故事，国际表达，主创团队还专门请到国外乐队对影片进行配乐诠释。与会专家认为，纪录片采取了网状叙事的策略，聚焦于青海高原丰富的自然生态，以及国家公园中的研究者、保护者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每个人都与自然形成了独特关系。同时，这部作品还将时间轴线置于叙事的考量中，展现了国家公园的样貌和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该片不仅对大自然的奥秘进行解构，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做了很好诠释，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。（许莹）